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63-10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孙小宇, 郑逸芳,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关键词: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社会;家庭;个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10

妇女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妇女问题的核心,是一切妇女问题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它不仅是妇女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1]。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的作用和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及妇女工作,要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障、法律等领域中的权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提升。但是,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3],妇女社会地位状况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妇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4],在现有的社会发展水平下,要满足不同身份妇女的收入、医疗保障、住房、教育

等需求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妇女社会地位的城乡不平衡依旧存在,存在着“城高乡低”、“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差距;性别歧视依旧存在,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就业过程中遭遇过歧视的女性占10.0%,男性仅为4.5%,即使是高层次女性人才,也有19.8%的受访者认为性别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阻碍;女性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和资源占有不平衡^[5],参与决策与管理仍面临阻碍,在领导岗位的占比远远低于男性,在第三期调查数据中,只有2.2%的女性为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仅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女性家务劳动负担依然存在,调查显示72.7%的已婚者认为妻子比丈夫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

基于此,本文聚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试图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收稿日期:2018-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空巢女性老人养老需求与老年福利供给性别策略研究”(14BSH045)

作者简介:孙小宇(1993—),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学、农村社会管理。

本文信息:孙小宇,郑逸芳,许佳贤.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63-72.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3”“CGSS2015”)数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及内涵,拓展妇女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探讨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以及当前妇女社会地位变化,并予以实证检验,并对如何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提出建议,以期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是社会分层的三个构成要素,社会地位是指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遵从与敬重^[6],是社会分层中反映社会名望的部分。目前,学者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内涵界定因研究需要的不同,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包含三种解释:其一,妇女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拥有和控制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的能力和程度^[7],如 Dixon, R. B. 认为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必定反映资源控制者的实际地位。其二,妇女社会地位就是指女性作为个体或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8]。满林彦认为,妇女的作用、威望以及权威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三要素,这三者之间互相制约、辩证统一,共同体现妇女社会地位水平^[9]。其三,妇女社会地位是指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比较社会地位,即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各方面与男性的平等程度^[1]。陈再华认为,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标准、特定对象、特定的参照物(例如男性)来确定的^[10]。因此,众多学者从性别结构视角出发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以男性群体的社会地位为参考系,以此来比较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整体差异^[11-12]。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界定大多集中在社会参与、家庭决策方面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但是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自我认可程度和自我评价。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妇女自我认可 and 自我评价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以期拓展学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内涵,丰富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研究。所以,本文认为妇女社会地位是指妇女在参与社会和家庭事务管理过程中与男性的平等程度,以及自我认可、自我评价的程度。

在探究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方面,本文借

鉴许红莉等^[13]、叶文振等^[8]学者的研究框架,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

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叶文振教授认为加快城镇化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8];另外,妇女解放运动领袖和妇女研究人员认为妇女要想摆脱家庭的束缚、实现独立自主、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就要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3]。联合国采用女性入学率、女性就业率、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的比例、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来测度妇女的社会地位。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采用健康、婚姻与孩子、教育、就业和社会平等 5 大类 20 个指标来评价妇女的社会地位。冯立天教授指出,妇女的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等 6 个方面都会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14]。因此,本文在研究妇女社会地位中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时不单单考虑妇女的城乡差异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更将妇女的社会平等、社会参与与劳动参与纳入研究范围。基于此,本文拟用政治参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等三个方面来表征妇女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政治参与程度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假设 2:户口性质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非农户口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农业户口妇女的社会地位。

假设 3:就业状况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目前有工作的妇女其社会地位要高于目前没有工作的妇女。

第二,在家庭层面上,妇女社会地位受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13];夫妻教育水平差异^[15]和夫妻收入差距^[16]是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也会体现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低^[3];本文拟用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负担、夫妻差异来衡量妇女社会地位中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家庭教育背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其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假设 5:家庭负担对妇女社会地位有负向影

响,家庭负担越重,妇女社会地位越低。

假设6:夫妻差异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夫妻差异越大,相对弱势的一方将会在生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

第三,在个人层面上,2010年12月我国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认为,妇女的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等9个方面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17];丁娟、李文通过进步与落后两个维度和共识与差异4个象限考察妇女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与态度,从而认为性别、城乡、教育、职业、年龄等因素对个体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影响,继而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18]。本文拟选用以妇女年龄、教育、收入变量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自我认可和性别意识来表示妇女社会地位中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7:人力资本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越丰富,妇女的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8:自我认可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自我认可程度越高,妇女社会地位越高。

假设9:性别意识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和2015年的CGSS,该调查从2003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所以剔除了男性的样本。在删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后,2013年数据得到有效样本3448个,占女性样本的60.68%。2015年数据得到有效样本3433个,占女性样本的58.84%。样本在城乡分布上比较均衡,2013年数据中有57.74%的女性为农业户口,42.26%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59.51%。2015年数据中有59.66%的女性为农业户口,40.34%的女性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56.34%。整体而言,样本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2013年数据中有70.10%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程度占64.33%;2015年数据中有71.19%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受

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程度占64.78%。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妇女社会地位。本研究用阶级认同的等级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通过数据处理,剔除掉拒绝回答和不知道的情况,等级用1~10分的整数来衡量,等级得分1分表示最底层,等级由低到高递增,10分表示最顶层。因此,本文将阶级认同等级为1~3分定义为社会地位较低,4~7分为社会地位中等,8~10分为社会地位较高。2013—2015年妇女社会地位变化如表1所示,社会地位较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数减少,但是社会地位中等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因此表明我国妇女社会地位整体而言正呈现一种上升趋势,社会地位两极分化正在减弱。

表1 2013年、2015年妇女社会地位变化

| 项目 | 2013年 | 2015年 | 变化 |
|--------|-------|-------|----|
| 社会地位较低 | 913 | 835 | 负向 |
| 社会地位中等 | 2423 | 2523 | 正向 |
| 社会地位较高 | 112 | 75 | 负向 |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分为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次,并对这三个层面的指标选择进行一定的丰富和拓展。

社会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政治参与、户口性质和目前就业状况三个方面,以表征社会层面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负担、夫妻差异。其中家庭教育背景包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家庭负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对老人赡养负担的考量,即主要分为生育子女的数量和家中老人数量两个方面。夫妻差异也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

个人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自我认可和性别意识。其中人力资本包括年龄、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2012年(2014年)全年总收入。自我认可在生活幸福感知的基础上考虑同龄人间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时间跨度上社会经济地位的纵向变化,分为三个方面: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性别意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性别分工、性别优势、自主观念、性别歧视和家务分工。上述变量的具体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说明 | 均值 | |
|--------|------------|---|--------|--------|
| | | | 2013年 | 2015年 |
| 被解释变量 | 社会地位 | 社会地位较低=1;社会地位中等=2;社会地位较高=3 | 1.768 | 1.779 |
| 社会层面 | 政治参与 | “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是否参加了投票?”否=0;是=1 | 0.451 | 0.468 |
| | 户口性质 | 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 | 0.423 | 0.403 |
| | 就业状况 | 目前没有工作=0;目前有工作=1 | 0.595 | 0.563 |
| 家庭教育背景 |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 2.724 | 2.775 |
| |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 4.379 | 4.178 |
| 家庭负担 | 家中老人数量 | “您家中有几个老人和您住在一起?”(个) | 0.228 | 0.227 |
| | 生育子女数量 | “您有几个子女?”(个) | 1.785 | 1.783 |
| 夫妻差异 |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 丈夫的受教育年数-女性的受教育年数(年) | 1.243 | 1.159 |
| | 夫妻收入差别 | 丈夫2012年(2014年)全年总收入(元)的对数-女性2012年(2014年)全年总收入(元)的对数 | 1.665 | 1.550 |
| 人力资本 | 年龄 | 2013年(2015年)时的年龄(岁) | 47.591 | 48.736 |
| | 受教育程度 |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 8.126 | 8.061 |
| | 个人收入 | 2012年(2014年)全年的总收入(元)的对数 | 7.833 | 7.558 |
| 自我认可程度 | 生活幸福感知 |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不幸福=1;说不上幸福不幸福=2;幸福=3 | 2.709 | 2.725 |
| |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 “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1;差不多=2;较高=3 | 1.704 | 1.715 |
| |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 “与三年前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下降了=1;差不多=2;上升了=3 | 2.351 | 2.260 |
| 性别意识 | 性别分工 | “您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不同意=1;无所谓同意不同意=2;同意=3 | 2.351 | 2.285 |
| | 性别优势 | “您是否同意‘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不同意=1;无所谓同意不同意=2;同意=3 | 1.984 | 2.004 |
| | 自主观念 | “您是否同意‘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同意=1;无所谓同意不同意=2;同意=3 | 2.161 | 2.160 |
| | 性别歧视 | “您是否同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应该先解雇女员工’”不同意=1;无所谓同意不同意=2;同意=3 | 1.410 | 1.410 |
| | 家务分工 | “您是否同意‘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不同意=1;无所谓同意不同意=2;同意=3 | 2.615 | 2.649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计量模型的选择

在回归分析中,有序概率模型(有序 Probit、有序 Logit 模型)常被用在因变量为有序变量的

情形下。为了探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本文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y_i = F(\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为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式(1)中, y_i 为被解释变量,即妇女社会地位; X_i 表示解释变量

(具体见表2); ε_i 为随机扰动项。函数 F 为某非线性函数,其具体形式

$$F(y_i^*) = \begin{cases} 1, y_i^* > \mu_{i-1} \\ 2, \mu_1 < y_i^* < \mu_2 \\ \vdots \\ j, y_i^* > \mu_{i-1} \end{cases} \quad (2)$$

式(2)中, $\mu_1, \mu_2, \dots, \mu_{j-1}$ 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 y_i^* 是样本妇女 i 潜在真实的社会地位,由于这个值不可观测,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y_i^* = \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二)结果分析

通过Stata12.0软件进行分析,表3列出了对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从2013年和2015年两年的估计结果来看,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在模型中的显著性状况都较为一致,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表3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

| 解释变量 | | 2013年 | | 2015年 | |
|------|------------|----------|-------|-----------|-------|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系数 | 标准误 | 系数 | 标准误 |
| 社会层面 | 政治参与 | -0.055 | 0.082 | 0.117 | 0.086 |
| | 户口性质 | 0.060 | 0.107 | 0.185* | 0.112 |
| | 就业状况 | -0.227** | 0.100 | -0.072 | 0.099 |
| 家庭层面 | 家庭教育背景 | | | | |
| |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09 | 0.014 | 0.012 | 0.016 |
| |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08 | 0.012 | 0.004 | 0.013 |
| 家庭负担 | 家中老人数量 | -0.140* | 0.074 | 0.126 | 0.082 |
| | 生育子女数量 | -0.038 | 0.047 | 0.005 | 0.047 |
| | 夫妻差异 | | | | |
| |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 0.066*** | 0.014 | 0.044*** | 0.015 |
| | 夫妻收入差别 | 0.082*** | 0.020 | 0.047*** | 0.015 |
| 人力资本 | 年龄 | 0.001 | 0.005 | 0.004 | 0.004 |
| | 受教育程度 | 0.067*** | 0.015 | 0.064*** | 0.016 |
| | 个人收入 | 0.103*** | 0.022 | 0.053*** | 0.018 |
| | 自我认可程度 | | | | |
| | 生活幸福感知 | 0.389*** | 0.068 | 0.581*** | 0.069 |
| 性别意识 |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 1.174*** | 0.080 | 1.183*** | 0.083 |
| |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 0.350*** | 0.067 | 0.338*** | 0.070 |
| | 性别分工 | 0.085 | 0.053 | 0.080 | 0.055 |
| | 性别优势 | -0.008 | 0.050 | 0.013 | 0.054 |
| | 自主观念 | -0.064 | 0.049 | -0.037 | 0.052 |
| 性别意识 | 性别歧视 | -0.005 | 0.061 | 0.155** | 0.064 |
| | 家务分工 | 0.179*** | 0.058 | 0.060 | 0.063 |
| | /cut1 | 4.618*** | 0.453 | 4.941*** | 0.438 |
| | /cut2 | 9.652*** | 0.485 | 10.556*** | 0.482 |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1. 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根据表3显示的回归结果,并结合上文所作出假设,本文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分别阐述其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1)社会层面。在2013年数据中,就业状况对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在2015年数据中,就业状况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就说明,就业状况

已经不再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另外,户口性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在2013年的回归分析中,户口性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后一时期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

(2)家庭层面。在家庭层面上,家庭教育背景对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的影响,母亲的受教育

程度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在家庭负担中,2013年变量家中老人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庭照料负担、家庭赡养负担就会加重,其社会地位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相反,2015年家中老人数量与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均不显著。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负担已经不再是阻碍妇女社会地位重要因素。在夫妻差异中,2013年和2015年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收入差别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性的影响。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和收入差别是通过丈夫的受教育年限(或2012、2014年全年总收入对数)一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或2012、2014年全年总收入对数)来衡量,其回归结果表明为夫妻间的受教育差别或收入差别越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人受男权文化的影响,男性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或较高的收入,妇女往往对男性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其他人对女性的态度及看法和女性本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往往受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其社会地位也会随着男性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自我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一种自我满足。

(3)个人层面。在个人层面上,2013年和2015年人力资本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较为显著,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同样妇女的收入越多,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年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2013年和2015年妇女的自我认可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都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妇女对现在生活的感知越幸福,其社会地位就越高;“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越高;“与三年前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的性别意识与其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性别意识上,2013年性别分工、性别优势、自主观念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家务分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女性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

务”这种说法越同意,妇女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但2015年家务分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不显著,由此表明传统的性别思想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减弱。2015年性别歧视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持这种观点的群体为女性管理者,其性别歧视意识仍然存在,在经济不景气时,出于理性的考虑会先解雇女性,但是这一部分群体的整体社会地位较高。其次,不赞同“经济不景气时先解雇女员工”的群体本身在工作中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其拥有较强的性别意识,认为自身社会地位较低,因此造成了回归结果的正向影响。

2. 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分析

有序Logit模型是概率模型,其系数大小不能反映该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为考察2013年和2015年不同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和变化,本文计算了妇女社会地位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详见表4。

纵观2013年和2015年不同因素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的大小和变化,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

具体来说,在社会层面上,2013年就业状况与妇女社会地位呈负相关关系,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在2015年中就业状况变量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由此表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外,户口性质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同样也与表3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在家庭层面上,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与回归结果一致。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负担中的生育子女数量对妇女社会地位均无显著影响;家中老人数量只对2013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显著,对2015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不显著。在两年的数据分析中,夫妻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夫妻收入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比较其影响程度,2015年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2013年的影响程度,由此说明夫妻差异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正在减弱。

在个人层面上,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上,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较2013年有所下

降。自我认可程度与妇女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幸福感知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程度增加,相反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和纵向变化的影响程度减弱。由此表明妇女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更

多地倾向于自身生活幸福感的提高,而不仅仅凭借自身的社会经济水平来衡量自身的社会地位。另外,性别意识与上文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表4 不同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 解释变量 | | 2013年 | | | 2015年 | | |
|--------|------------|------------|------------|------------|------------|------------|------------|
| 一级变量名称 | 二级变量名称 | 社会地位 较低 | 社会地位 中等 | 社会地位 较高 | 社会地位 较低 | 社会地位 中等 | 社会地位 较高 |
| 社会层面 | 政治参与 | 0.009 | -0.007 | -0.002 | -0.018 | 0.015 | 0.002 |
| | 户口性质 | -0.010 | 0.008 | 0.002 | -0.028* | 0.024* | 0.004* |
| | 就业状况 | 0.037** | -0.030** | -0.007** | 0.011 | -0.009 | -0.001 |
| 家庭教育背景 |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01 | 0.001 | 0.000 | -0.002 | 0.002 | 0.000 |
| |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01 | 0.001 | 0.000 | -0.001 | 0.001 | 0.000 |
| 家庭负担 | 家中老人数量 | 0.023* | -0.019* | -0.004* | -0.019 | 0.016 | 0.003 |
| | 生育子女数量 | 0.006 | -0.005 | -0.001 | -0.001 | 0.001 | 0.000 |
| 夫妻差异 |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 -0.011*** | 0.009*** | 0.002*** | -0.007*** | 0.006*** | 0.001*** |
| | 夫妻收入差别 | -0.013*** | 0.011*** | 0.002*** | -0.007*** | 0.006*** | 0.001*** |
| 人力资本 | 年龄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0 |
| | 受教育程度 | -0.011*** | 0.009*** | 0.002*** | -0.010*** | 0.008*** | 0.001*** |
| | 个人收入 | -0.017*** | 0.014*** | 0.003*** | -0.008*** | 0.007*** | 0.001*** |
| 自我认可程度 | 生活幸福感知 | -0.063*** | 0.051*** | 0.012*** | -0.088*** | 0.076*** | 0.012*** |
| |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 -0.191*** | 0.155*** | 0.036*** | -0.179*** | 0.155*** | 0.025*** |
| |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 -0.057*** | 0.046*** | 0.011*** | -0.051*** | 0.044*** | 0.007*** |
| 性别意识 | 性别分工 | -0.014 | 0.011 | 0.003 | -0.012 | 0.010 | 0.002 |
| | 性别优势 | 0.001 | -0.001 | -0.000 | -0.002 | 0.002 | 0.000 |
| | 自主观念 | 0.010 | -0.008 | -0.002 | 0.006 | -0.005 | -0.001 |
| | 性别歧视 | 0.001 | -0.001 | -0.000 | -0.023** | 0.020** | 0.003** |
| | 家务分工 | -0.029*** | 0.024*** | 0.005*** | -0.009 | 0.008 | 0.001 |

注: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3.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2015年的实证分析中,户口性质对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妇女社会地位存在城乡间的差异。因此,本文根据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分成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进行分样本回归,以分析妇女地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对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2013年夫妻收入差别、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和妇女持有的性别意识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2015年仅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在社会层面上,2013年和2015年政治参与对城镇和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有显著影响。2013年就业状况对农村妇女影响显著,对城镇妇女影响不显著。2015年就业状况对农村和城镇

妇女均没有显著影响,与上文结论一致,由此表明我国农村妇女地位不断提高。

在家庭层面上,2013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2015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没有显著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城乡教育差异减弱,妇女教育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而不是家庭教育获得。家中老人数量对两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2013年其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2015年其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显现,社会地位提高。生育子女数量对两年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在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方面,其两年都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对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没

有显著影响,以此来说明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对农村妇女的影响要大于对城镇农村妇女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2013年夫妻收入差异对农村和城镇都有正相关关系,但2015年夫妻收入差别仅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夫妻收入差距依然是影响城镇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

在个人层面上,年龄在2013年和2015年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2013年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2015年其只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影响,由此表明现阶段我国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缩小农村夫妻间的教育程度差别,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2013年妇女个人收入对城镇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但2015年妇女个人收入对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我国农村正在改变以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的现状。

在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上,纵观2013年、

2015年数据,生活幸福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

在妇女所持有的性别意识上,2013年变量自主观念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妇女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认同越高,其社会地位越低。家务分工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影响显著,这表明农村妇女被繁重的家务所束缚,均等的分摊家务有利于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农村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2015年性别优势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负相关关系,对“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观点越认同,其社会地位就越低;性别歧视对城镇妇女社会地位有正相关关系,其可能的原因与上文一致。因此,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要积极提高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摆脱“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传统观念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错误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发挥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

表5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 解释变量 | | 2013年 | | 2015年 | |
|--------|------------|----------|-----------|----------|-----------|
| 一级变量 | 二级变量 | 农村样本 | 城镇样本 | 农村样本 | 城镇样本 |
| 社会层面 | 政治参与 | -0.141 | 0.105 | 0.063 | 0.243 |
| | 就业状况 | -0.266** | -0.236 | 0.054 | -0.322 |
| 家庭教育背景 |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34* | -0.021 | 0.010 | 0.029 |
| |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10 | 0.031* | 0.011 | -0.003 |
| 家庭负担 | 家中老人数量 | -0.205** | 0.000 | 0.163* | 0.004 |
| | 生育子女数量 | -0.068 | 0.017 | -0.003 | 0.057 |
| 夫妻差异 |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 | 0.080*** | 0.041 | 0.045*** | 0.044 |
| | 夫妻收入差别 | 0.068*** | 0.118*** | 0.027 | 0.091*** |
| 人力资本 | 年龄 | 0.006 | -0.008 | 0.005 | -0.001 |
| | 受教育程度 | 0.082*** | 0.046* | 0.076*** | 0.041 |
| | 个人收入 | 0.090*** | 0.153*** | 0.033 | 0.101*** |
| 自我认可程度 | 生活幸福感知 | 0.357*** | 0.460*** | 0.514*** | 0.753*** |
| | 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感知 | 1.118*** | 1.282*** | 1.116*** | 1.406*** |
| | 社会经济地位纵向变化 | 0.343*** | 0.379*** | 0.206** | 0.637*** |
| 性别意识 | 性别分工 | 0.083 | 0.094 | 0.078 | 0.095 |
| | 性别优势 | -0.018 | 0.015 | 0.091 | -0.170* |
| | 自主观念 | 0.045 | -0.224*** | -0.010 | -0.091 |
| | 性别歧视 | -0.101 | 0.157 | 0.115 | 0.259** |
| | 家务分工 | 0.241*** | 0.049 | 0.029 | 0.144 |
| | /cut1 | 4.706*** | 4.529*** | 4.496*** | 5.985*** |
| | /cut2 | 9.754*** | 9.658*** | 9.573*** | 12.510*** |
| | 样本量 | 1 991 | 1 457 | 2 048 | 1 385 |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CGSS2013 和 CGSS2015 数据,从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考察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别、夫妻收入差别、受教育程度、收入、自我认可对妇女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夫妻教育程度差别越大,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夫妻收入差别越大,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妇女受教育程度、收入越高,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妇女自我认可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同时,本研究通过对女性社会地位边际效应分析以及城乡差异分析,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并且研究表明,妇女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因此,为了改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应该从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和女性个人等6个层面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在政府层面上,立法部门要完善立法和政策建设,审视清理和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的内容;加强普法,使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加大执法力度,打击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教育部门应坚持教育公平的原则,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女性自主创业,为女性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助和扶持^[19];推行女性继续教育制度,使失业妇女再就业。另外,重视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对维护妇女权益的作用,集中整合政府、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的资源,统筹城乡,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联动的妇女事业支持网络体系^[3]。

在社区层面上,开拓女性就业的多元化渠道,积极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和发展社区小企业,为社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要充分发挥社区功能,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完善社区幼儿园、医院等设施,促进家务社会化,以缓

解职场压力和减轻家务负担。

在就业单位层面上,各类用人单位要落实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相关政策,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另外,提高女性在用人单位决策和管理层的比例,确保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保障。

在社会舆论层面上,首先大众传媒管理者要将性别观点纳入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中,使大众传媒工作者破除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其次,大众传媒要向全社会广泛深入宣传先进的性别意识,引导人们树立两性平等的意识,营造一种“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最后,大众传媒要广泛听取妇女的多种声音,形成有社会性别视角的舆论环境和舆论监督^[20]。

在家庭层面上,转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倡导“男女平等、夫妻比翼、分享家务、共同发展”的理念,破除旧的家庭分工,均等地分摊家务,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提高女性社会竞争力。

在女性个人层面上,一方面妇女应该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增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缩小夫妻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夫妻间的收入差别。另一方面,妇女应该提高自我的认可程度和端正自己的性别意识。男权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处于自我满足状态^[8]。因此,女性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自我的认可程度和自信心,端正自己的社会性别意识,通过不断学习以充实和提高自我,真正从思想上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摆脱自我满足状态,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许多变量仅仅是从问卷中选用的代表变量,没有采用更加精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对变量的适用性和测量的精确性方面加以提高。

参考文献:

- [1] 韦惠兰,杨琰. 妇女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1999(2):97-103.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李超海.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29-135.
[4] 王金玲. 转型与发展——福建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 2000—2010[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 [5]山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冯锦彩,刘宁.我国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及应对思路——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省数据为蓝本[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1):86-90.
- [6]Renzetti C M, Curran D J.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J]. Living Sociology, 2000:197.
- [7]Dixon-Mueller R B. Rural women at work: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M]. Routledge, 2013.
- [8]叶文振,刘建华,杜鹃,等.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刊,2003(5):22-28.
- [9]满林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现状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6.
- [10]陈再华.妇女地位综合评价指标探讨[J].中国人口科学,1993(6):39-44+51.
- [11]颜士梅.台湾妇女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成因[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8-63.
- [12]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J].学术研究,2014(1):42-49.
- [13]许红莉,吴锦峰.女性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2,24(17):94-96.
- [14]冯立天,陈再华.北京城市妇女地位调查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4(1):29-41.
- [15]沈安安.家庭文化模式对妇女地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4(4):51-58.
- [16]顾鉴塘.北京市城区在业妇女经济收入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4(5):44-51.
- [17]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 [18]丁娟,李文.关于妇女社会地位认知与态度基本状况的分析与思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6):7-17.
- [19]徐晓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对策——以忻州为例[J].理论视野,2015(10):82-84.
- [20]陈秀云.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中国的实践与探索[J].妇女研究论丛,2005(S1):92-95.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3, 2015

Sun Xiaoyu, Zheng Yifang, Xu Jiex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Women's social status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gns of social change, but also a crucial measurement of progress in social civilization. By using the CGSS2013 and CGSS2015,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from three levels: the social, family and individua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income level, education level, income, and women's self-recogni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social statu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couples differences, human capita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women's social status has been weakened through two years of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of urban and rural samples,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and urban women has been improved, but there lies rural-urban difference in women's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government, community, employment, public opin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re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so as to form a concerted effort to promote women'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women's social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society; family; individual